

晋绥抗日根据地西农币的信用构建

何家伟 常琛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晋绥根据地成立银行,发行西农币并不断尝试构建其信用。前期,根据地西农币作为法币的辅币逐步推行,但因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而面临信用危机。此后,根据地不断进行尝试,首先实行单一币制,而后转向复币制,但均遭失败,并因政策的摇摆不定引发通胀,使西农币信用不断滑落。总结经验后,根据地开始重构西农币信用,思想先行并加强基层治理,坚定西农币领导权,而后将清理非本位币与扩大西农币阵地相结合,建立西农币货币市场,并将调控物资与发展商业作为巩固西农币信用的重要手段,最终稳定西农币信用。西农币信用建设的成功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亦体现其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

关键词:晋绥根据地;西农币;货币信用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6-0146-12

晋绥根据地地处山西省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不仅肩负保卫中央安全,确保党中央与各敌后根据地联系之责任,且深处敌后,与日军直接作战,其发展好坏直接影响敌后抗战态势。西农币作为晋绥根据地发行的红色货币,其信用建设是保证根据地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西农币从发行到信用体系建立,其间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西农币信用体系的建设成功与边区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边区经济发展情况密切相关。近年来,关于西农币的研究,学界已有部分成果,多涉及西农币的发行、流通及货币斗争,^①但关于西农币信用建设的专题性研究仍不多见。本文不揣浅陋,以山西省档案馆所藏晋绥根据地有关档案为主,以日伪军及国民政府史料为辅,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晋绥根据地西农币信用建设的探索历程进行梳理,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初试牛刀”:西农币信用的构建尝试(1937—1940)

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八路军120师于1937年10月开赴晋西北地区,在配合国民政府抗击侵华日军的同时,“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1]。随着1937年11月初太原沦陷,日军于11月中旬推进至黄河北岸,山西境内的大规模战役已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开始成为抗战的主要形式。

为满足军需民用,支援抗战,根据地开始筹备小型银行,进行有益尝试。1937年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兴县开明绅士刘少白牵头动员百位富户出资,成立兴县农民银行,先后动员资金6万余

收稿日期:2025-05-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抗战时期红色货币斗争史研究”(24ADJ007)。

作者简介:何家伟,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9)。常琛,男,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中心副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9)。

元^[2]。至1938年年末,银行共印行1元、2角、1角三种面额货币10万元。兴县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流通券性质,随后根据地各地发行多种流通券,以调剂金融、支援财政。

1940年年初,根据地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建立区域性银行被提上日程。1940年2月,行署根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建议,在全根据地进行了扩兵、做军鞋、献粮、献金四大动员,全区报名参军青年达1.5万人,献粮10万石,献金10万元。在解决兵源军需的同时,为根据地银行的成立筹集了大量准备金。1940年5月10日,西北农民银行成立。银行以“民众自动献交给政府的法币三百万元充当银行的基金”^[3]³⁷开始发行西农币。此时,银行将西农币与法币挂钩,规定“发行农钞,一律以法币为本位”^[4]⁵¹,西农币作为法币的辅币进行流通。

西农币发行初期依附法币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是党中央指示。1940年4月,党中央要求北方各根据地建立银行后,必须“澈底取缔伪钞,以新钞吸收法币”^[5]³⁶³。由于这一时期各根据地立足未稳,加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央暂时允许法币流通,晋绥根据地亦不例外。二是根据地内法币取代晋钞成为主要货币。抗战初期,山西境内晋钞在市场内处于主体地位,晋西事变后,晋钞币值迅速下跌,根据地政府以此为契机对晋钞等土杂钞进行彻底清理。根据地以法币为武器,先行清理晋钞,规定所有田赋、税款的征收都以法币为标准。行动迅速取得成效,1940年5月初,晋钞由“十二、三元跌落到四十余元”,乃至根据地内“通货紧缩”^[4]⁴⁹⁻⁵⁰。不日,根据地发行5角面值西农币,并顺利流通。

西农币发行之初,根据地政府即出台相关制度、配套政策,以稳定西农币信用。首先,明确西农币发展方向。根据地提出“在金融上,必须做到确实巩固农币,使农币真正成为晋西北的唯一本位币,并深入到广大农村的流通中去”。其次,要求银行与各部门相互配合,提高农币信用。贸易方面,要求银行“应与贸易机关密切联系,管理外汇市场,充实外汇资金并且有计划的供给物资”。同时,强调银行资金应着重流入生产领域,“多投资于生产事业”,并“帮助合作社活跃市场,以提高农币信用”^[6]⁴⁷²。最后,以多种方式宣传新生货币,如“咱们西北农民银行的票子好比是金镶的,铁打的,永远也不会瞎的”^[3]⁶⁷等,扩大西农币影响力。这一时期,根据地的种种措施为西农币拟定了发展方向,但发行不久,

西农币的信用即惨遭滑落。

如图1^②所示,西农币与其本位币法币的比价在发行后的8个月间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反映出其信用的持续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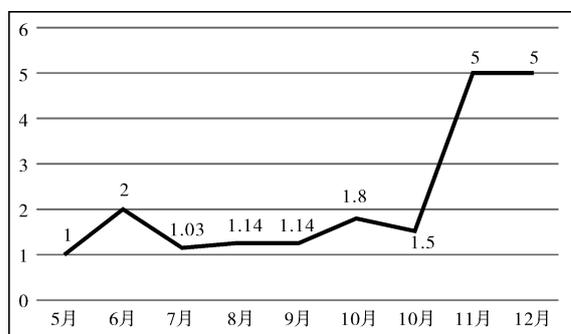


图1 1940年5月—12月西农币与法币比价图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如下:其一,日军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导致西农币信用难以维系。1940年下半年,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6月,日军集结第一军一部与驻蒙军相配合,意图消灭兴县、临县、岢岚及岚县的根据地政权^[7]。年末,日军再次向根据地发起扫荡,彭德怀指出,此次“敌向我们抗日根据地之‘扫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我们必须足够的估计此次大‘扫荡’之严重性、残酷性”^[8]⁵⁸⁴。根据地政权因此受到较大打击,仅兴县就有260多个村庄被毁、1384人被杀^[9]。政局不稳引发货币信用衰退。如图1所示,6月日军扫荡时,2元西农币仅可换法币1元,7月反扫荡结束时,即升至1.03元西农币换1元法币。10月,日军向文交地区袭扰,西农币币值滑落至1.8元换法币1元,战局平稳后回涨至1.5元换法币1元。年末,日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扫荡,西农币4—5元方可换取法币1元^[4]⁵⁰。可见,日军对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是西农币发行初期信用滑落的主要原因。

不仅如此,日伪妄图以货币为工具,使占领区摆脱原有金融机制,建立沦陷区新秩序。1938年3月,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并发行联银券,以代替中国的法币,保证贸易中日方的有利地位^[10]。仅1938年,联银券发行总额为9.8亿元^[11]。货币滥发必然引发信用危机,仅数月后,联银券兑法币的汇率逐渐下降^[12]。为稳定联银券信用,日方不断进行政策调整,1940年3月19日,日伪开始在沦陷区使用联银券收税、设置联银券交换所,并在重要地区设置联银券管理署^[13],意图与法币对抗。至1940年9月,联银券在山西省发行67804284.82元,推定流通量为5500万元^[14],成为山西境内流通的主要

货币。为扩大势力,日伪实施经济封锁,禁止必需品输入根据地^{[6]461}。同时在民间对西农币信用进行打击,宣传“晋西北终究是保不住的,西北农钞不但不能用,而且存此票者还得受害”,并在实际使用中对“西北农钞贬值使用,或完全抵抗使用”^[15]。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在经济领域的角逐中落入下风,伪钞“向敌我错综的区域侵入,甚或邻接敌占区的根据地内也在暗流”^{[4]58}。

其二,根据地的货币实践有待改进。首先,西农币发行量过大,导致币值下跌。西农币发行初期,由于与法币尚且等值,为补充军需民用,银行贸然于1940年8至9月间大量发行1元及2元西农币共计230万元,以致市场货物供不应求。在临县,各部队、公营商店纷纷以整捆整驮农币竞购货物,或委托小商在黑市调换银洋、法币,以致西农币信用日下,商民纷纷贬价、拒用农币。西农币与法币的比值开始上涨,在交易时向法币每元贴水徘徊于1角3至4分^{[4]50}。其次,白洋^③的大量流通对农币信用造成打击。政府于1940年8至9月时为购买冬衣大量使用白洋,而且允许在民间商人之间流通^{[4]52},大大挤占了农币市场。此外,内部商业及对外贸易的萎靡阻塞货币流通。因根据地地处偏僻且连年战乱,百姓货物数量有限,大多使用物品直接交易,内部市场日常交易“物物交换占主要地位”,市场交易减少导致货币基本丧失其功能,民众对于货币的需求及信任度较低,此种情况在二、三、六区等地时有发生^{[4]496}。对外贸易时,根据地禁止土产出口导致外汇储备不足,且中央禁止各地货币互相流通^{[5]361},商人只得低价兑换法币向境外购买货物,如此更打击了西农币信用。

其三,国民政府停发军饷及取缔红色货币,造成西农币信用失位。一方面,国民政府停发部队军饷,致使根据地货币储备不足。1939年5月,国民政府以八路军“不听指挥为借口,过去原有之经费亦将完全停止发给”^{[8]343}。经费的缺乏致使根据地财政主要依靠“献金”及借款,1940年1至8月间,二者比重为总收入的70%。依靠“献金”,此间根据地收支勉强平衡,但原定作为银行发行准备金的资金因“财政上没有办法”被挪用,借支银行基金782836712元晋钞^{[16]2-4}。准备金被挪用直接导致了银行信用下降,外汇储备不足进而引发货币信用危机。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不断利用行政命令对新生货币进行限制打击。抗战初期,党在华北地区兴办银行,蒋介石“屡电取消边区银行,并责以影响法

币跌价”^{[8]343},对红色货币进行限制。1940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中共所发行之钞票,根本均非适法”,并禁止根据地货币流通,“一经查获,无论数量多寡,应立即扣留转送财政部核办”^{[17]338}。并于西农币发行之初,即对其流通情况、发行额等进行调查^{[17]343-345},亦宣布其为非法,使之在政治上失位。

综上所述,西农币发行之初,仅作为辅币流通,其信用构建仅存在于小型交易中。尽管中国共产党力图初步构建其信用并设定发展方向,但囿于种种因素收效甚微,西农币在发行初期面临信用危机。

二、“步履维艰”:西农币信用的波动与维系(1941—1943)

面对西农币发行后的信用危机,根据地进行种种尝试,试图稳定货币信用,由单一本位币制转向复币制再回到单本位,但政策的反复摇摆实际上加剧了西农币信用的下滑,最终西农币信用滑落至谷底。

1940年年末,面对西农币发行后的信用危机,根据地重申西农币单一本位制,并着手落实对外部货币的政治禁令。11月27日,《抗战日报》^④社论中提出“禁止白洋杂票在市面流通”^{[4]160}。1941年2月,行署财政处长宣布“为了保护法币不使外流,决定停止法币在市面上行使,并决定只准行使西北农民银行钞票”^{[3]111},期望扫清西农币流通障碍。

不过,政治上的禁令并不能完全规范金融市场的种种乱象,日常交易中,银洋与法币仍充当主角。以兴县为例,银洋被禁用后,商民在交易中普遍选择使用法币,1941年2月各类交易中,法币占60%,银洋占16.6%。但2月根据地禁用法币后,根据地交易又转而使用银洋,3月至5月,银洋在各类交易中的使用占比从23.3%涨至81.6%^{[4]58},成为根据地货币市场中的主体货币。根据地对银洋的禁令基本失效。

银洋的广泛流通由来已久。作为金属货币,银洋在本质上区别于法币、西农币等信用货币。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广大农村,金属货币被视为硬通货,日常交易时极少受到地域、政权的限制,使用场景远多于西农币,农民可以使用银洋前往敌占区及后方购买货品。而此时,法币式微,向敌占区购货日渐困难,后方法币区域又没有大量的货物可供购买,且日渐通胀^{[4]57},自然引发良币驱逐劣币现象。

这期间,西农币的信用滑落不止表现在市场占有率低,还体现在其币值的进一步下滑。娄烦地区,

1 月间白洋 1 元合农币 15 元左右,3 月间即涨到 35 元上下。兴县地区,3 月 19 日白洋 1 元合农币 20 元上下,至 4 月间即涨至 50 元。河曲地区,3 月间白洋 1 元兑换农币 12 元,至 4 月间即为 32 元。不仅如此,农币几乎每日都在波动。以币值较为稳定的娄烦为例,其间仅 5 月 23 日至 6 月 3 日间以同一价格稳定了 12 天^{[4]56}。西农币的信用波动激发了种种投机行为,官方尤甚,1941 年年末兴县扣获的五件暗使银洋案中,机关部队就有三件,临县三交所发现的金融投机者,亦系机关部队的人^{[4]166}。

面对西农币信用的不断下滑,党意识到单纯从政治上强行推行农币并不切实,于是选择在政治上保证农币的主体地位而在经济上实行复币制。这期间,西农币被置于辅币位置,银行首先联合法币,打击银洋,法币势弱后又默许银洋流通。根据地试图以多币共存的复币制循序渐进提升西农币信用。

为打击银洋,根据地开始适度给予法币空间,以法币挤占银洋流通。1941 年 10 月,根据地允许法币在中小型交易中使用,调换 500 元以下的不究,500 元以上带有投机捣乱性质的按规定处办,但私自运往敌占区,金额在 8000 元以上者处死刑^{[4]12}。很快,货币市场中的法币成为主要货币。1942 年 1 月,除兴县外,保德县法币的市场占有率达 80%,临县为 85%^{[4]67}。

同时,根据地政府吸取前期对银洋管理不周的失败经验,制定了严苛的处罚条例。1941 年 11 月 1 日,根据地颁布《晋西北修正扰乱金融惩治暂行条例》,规定贩运银洋在千元以上行使在 2000 元以上者处死刑,如贩到敌区在 500 元以上者处死刑,其他处徒刑与罚金^[18],并重点严令“机关、部队、团体及其所办之商店使用银洋者,从重治罪,除处分使用者外,并须处分该机关或商店之领导人”^[19]。为达目的,根据地在各分区成立专门机构确保政策落地,临南县“组织了缉私委员会,由军政民机关各出干部一人共同组成配合查缉”,保德县“接到行署命令后,马上将县府所存之违禁品解送银行及专署”^{[3]186}。

查禁银洋的行为在民间取得了初步成效。兴县地区效果最佳,1941 年 11 月禁令公布时即查获案件 7 起,白洋 894 元,12 月查获 37 起,共计“银宝 50 两,白洋 481 元”^{[3]187},如机关某干部因违规私带白洋被判刑^[20]。其他地区亦有成果,保德县“缉获使用白洋者 11 件,没收白洋 192 元”^{[3]185}。

从结果看,根据地先前银洋广泛流通的现象得

到遏制,货币领域出现短暂真空,银行立刻发行大量西农币进行填补,再准许民众接受度较高的法币流通常用于小型交易,最后向市场投放足量物资。1942 年初期,根据地的金融渐渐稳定。

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地联合法币的政策遭到打击。1942 年前后,日伪以打倒“旧法币”为目标,废止新旧法币的等价兑换^[21],并不断打击法币信用,强以伪币兑换法币,以手中存握大量法币盗购后方物资^[22],形成法币倒流。这使敌后战场的法币渐渐势弱,根据地不得不在部分地区禁止法币使用,缺少法币的压制,银洋渐渐恢复流通。此外,尽管对民间银洋进行查处,但根据地政府对外贸易时“大宗货物依赖敌占区或友区输入,大量入超,外汇支付手段主要依靠白洋”^[23]。政府在支付结算时难以摆脱对银洋的依赖。

无奈之下,根据地逐步放松对银洋的管制。1942 年 5 月,根据地顺利收取烟苗预借款,默许 5 元以下的白洋流通不予查究^[23]。此举虽令政府收到足额银洋,但却为其流通开放绿灯。不仅如此,为成功收取款项,至 7 月根据地令银行主动贬低农币牌价^[23],更打击了农币信用。

种种现象在根据地内引发了是否允许白洋流通的争论。1942 年 10 月,晋西北行署召开高干会,有干部认为“1943 年没有一半白洋,收入则不能解决问题”,提出印发白洋流通券,像期票可以兑现^{[4]111}。林枫指出这是“投降地主的白洋本位思想”^[23]。实际上,会后根据地虽未完全开禁白洋,但已默许行使^{[4]110}。

法币、银洋的相继恢复流通,使根据地货币市场形成复币制格局。由于西农币一直处于辅币位置,依托于法币、银洋的良好信用,如图 2^⑤所示,西农币的信用得到短暂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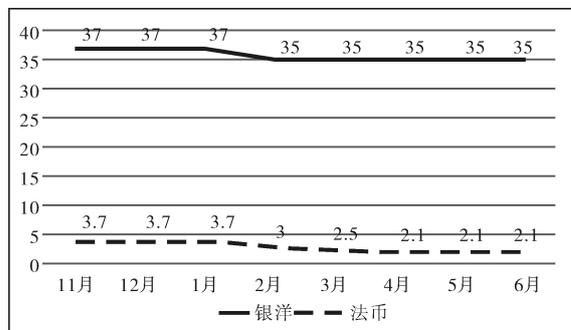


图 2 1941 年 11 月—1942 年 6 月兴县地区西农币与银洋、法币比价图

不过,货币主导权异位并非长久之计,实行复币制亦有其弊端。一方面,敌伪利用法币不断破坏根

根据地金融,1942年4月起,日伪从“柳林、大武等处向根据地运进不少法币,大量骗买皮毛、桐油、白麻、药材”^{[3]115}。货币市场内的法币日益拥挤,信用大不如前,最低时农币1.3元即可兑换法币1元^{[4]95}。法币信用下滑自然引发根据地物价上涨,“连累民商破产的很多”^{[3]114}。另一方面,银洋横流亦削弱根据地政府对金融的掌控力。对于银洋态度不一致令其“禁又没有彻底,开又没有执行”^[23]。根据地金融秩序亟须调整。

1942年年末,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召开,根据地内部思想渐趋统一,重新筹划将复币制过渡为单一币制。根据地首先以法币为打击目标,1942年年底公布《晋西北非法周使法币之缉查与惩治办法》,宣布以1943年1月15日为期,对商民所有法币全部予以没收,行使超过100元者,没收同时处罚金或拘役,并对举报使用法币者实施奖励^[24]。禁令实施后,法币形同废纸,加之在大额贸易中“失掉了外汇支付手段的作用”^[23],很快退出流通市场。银洋查禁过程则较长,1943年1月,根据地决定采取具体步骤,准备禁止银洋的流通^{[3]115}。同月发行银洋公债,以期吸收民间资本,充实西农币准备金^[25]。

随着非本位币逐渐退出市场,根据地开始在经济领域巩固西农币。首先,实施贸易统制,增强物资储备。1943年1月16日,行署宣布“严禁奢侈品入境”,并一改“过去广泛的许可制度”,决定严格管理对外贸易^[26]。2月,根据地宣布禁止民间对外贸易,规定“一切对敌占区进出口经营,均由贸易局及指定机构办理”^[27]。其次,以贷款形式推行西农币下乡。贷款是党推行红色货币的重要手段,但晋绥根据地在前期发放农贷数量实际较少,1941年发出贷款20万元,1942年也仅为30万元^{[3]426}。1943年1月,银行公布《西北农民银行农业贷款暂行章程》,为农贷制定具体细则,并提出“农业贷款是本年度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28]。2月,银行公布农贷补充细则,着重规定还款时西农币币值波动,可按适当折扣偿还借款,以提升西农币民间信用^[29]。农贷发行额也随之扩大,同月,西北农民银行决定在河曲、保德、偏关、岢岚四县发放农贷90万元,金额超前两年之和^[30]。最后,吸收市场内多余无用的西农币。根据地根据地将库存物资如米、面等,通过公营商店大量折价投放市场,并规定必须收取西农币。兴县、临县1943年3月间即拿出共1000石公粮,按市价折价5%在各大重要市场销售。此外,银行主动将牌价降至黑市价的95%,鼓励货币兑换^[31]。

制度上的巩固为西农币的扩大推行打下基础。1942年年末,西北农民银行发行5元、10元面值钞票,1943年随之发行50元面额^[23],意图在大宗交易中占据地位。同时,西农币的发行额激增,1942年,西农币发行额为550万元,1943年全年西农币发行额增至79438218.50元^{[3]45},以填补禁绝银洋、法币后的市场空缺。多项激励措施之下,西农币币值渐渐稳固,与银洋的比价在1943年1—6月间一直稳定于50。且由于农贷的增加发行,西农币大量流入乡村,扩大了流通范围^[23]。

不过,西农币数量激增与大面额钞票的发行使根据地存在通胀可能。政府虽然努力调剂市面西农币数量,但与发行数额相比仍相形见绌,一旦市面货物供应不足、流通受阻,势必导致物价上涨、币价下跌。因此,1943年6月后,西农币的币值开始逐步滑落。

如图3^⑥所示:1943年7月,西农币与银洋的比价为60,开始呈上涨趋势,但此时,银行的发行实物准备与发行额几乎相等,且实物基本分发到广大农村,满足交易所需,故尚未引起波动。同时,西农币继续扩大发行,8月发行额为7月的120%。但此时根据地仍维持相当实物储备,8月至9月间西农币虽逐渐落价,但交易时使用却日渐频繁,直至此时,西农币仍呈现良性运行态势。但自10月起,日伪对根据地发起扫荡,支持本币的物资接济困难,无法与西农币的发行量进行对冲,通胀隐患爆发,西农币币值开始大幅下跌,与银洋的比价升至120^{[4]114-116}。扫荡结束后,部分金融干部的思想发生偏差,“认为纸币只要能发出去买来东西,落价是不要紧的”^{[4]115},并未及时巩固币值,西农币的币值再次下跌。该阶段,尽管根据地根据地将复币制转变为单本位,确立了以西农币为主体的单一币制,同时出台种种措施稳固西农币信用。但由于外部的军事压力及内部政策执行的偏差,西农币信用不升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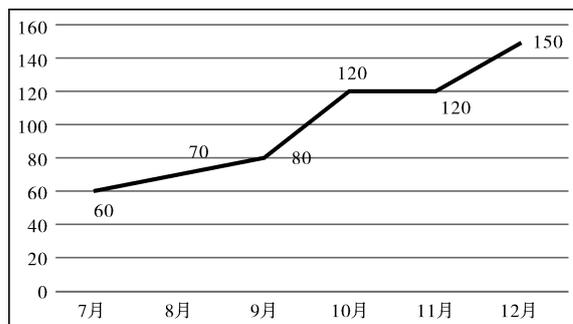


图3 1943年7月—12月西农币与银洋比价图
总体而言,政策的“左右摇摆”是1941年至

1943年西农币信用滑落的主要原因。西农币发行初期,货币信用微薄,理应借助法币、晋钞等强势货币为其背书,不断移植强势货币信用,但根据地在西农币立足未稳时严禁除西农币外的其余货币行使,并未为西农币创造交易需求,导致黑市与私商盛行。实行复币制后,初期借助法币及白洋的强信用,西农币的流通范围渐渐扩大,但在需要继续拔高西农币信用时,根据地没有及时摆脱对法币、白洋的依赖思想,导致西农币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此外,根据地在贸易、物资管理生产等领域时而与金融政策各自为政,没有与西农币产生良性互动。最终西农币信用跌落谷底。

三、“三驾马车”:西农币信用的 重构与巩固(1944—1945)

至1943年年末,西农币的信用岌岌可危,根据地“金融发生很大波动,致使物价高涨,市场紊乱”^{[4]37}。同时,虽然根据地金融工作开展已久,但因种种偏差始终未取得较大成效,改革迫在眉睫。1944年年初,根据地连发两封关于稳定金融的秘密指示,并提出:“晋绥边区的贸易金融工作,还没有基础,不少工作尚在摸索中,急待大踏步的开辟。”^{[4]40}因此,迅速构建西农币的信用体系,以此推动根据地金融稳定,是党此时的重要任务。

1. 统一思想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坚定西农币领导权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刘少奇曾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32]种种惨痛教训让边区政府认识到,不论是带有资产阶级属性的法币还是带有封建色彩的银洋,边区只可短期借用其力量为革命政权服务,而不能长期依赖,如果不抓住货币领导权,金融领域的革命就无法成功。边区政府在总结货币斗争经验时亦认识到:“货币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斗争,并且还是一种思想斗争。”^{[4]128}在干群思想上巩固西农币信用,并紧抓基层干部政策落实情况,是西农币信用体系的立魂之本。

其一,将整风精神融入金融工作,提高干部思想认识。银行干部作为构建西农币信用体系的具体执行人,对西农币的信用构建有着重要影响。兴县干部对禁止银洋认识较好,本币信用也较好。而神府地区曾有少数干部认为禁用银洋是脱离群众,故银洋禁止得较迟,本币信用较差^{[4]129}。西农币币值下

跌时,整风运动如火如荼,故边区适时将整风精神与金融工作结合,扭转部分干部思想,增强巩固西农币信用的信心。针对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边区要求各级干部应时常反思总结,譬如“对巩固本币驱逐伪钞,禁用银洋的政策,认识如何,曾发生过什么错误的想法,如怀疑、放任、没有信心”,并要求“用实际材料说明”^[33]。不仅如此,边区常召集各级干部集中总结问题与经验,分析讨论各地西农币信用构建情况。1944年9月,“本币缺失,币价又不见提高”,边区要求各级干部撰写报告,“介绍出好的创造,也要举出失败的教训与坏的例子”^[34]。

其二,开展群众教育,增强群众对西农币的信心。随着西农币信用的起伏,百姓对西农币的实际使用欲望参差不齐,如1943年静乐县“老百姓总是喜欢白洋,不喜欢本币”^[35]。西农币流通不断受阻使边区政府意识到:“群众对于本币的态度,除过经济的原因外,还取决于政治上的认识。”^{[4]150}对此情况,除客观上利用物资、外汇等手段加强西农币信用外,在主观上让百姓接受西农币十分必要。边区在多种场合下对群众加强货币本位教育,分别在“变工队里、冬学里、合作社里教育群众,本币对于基本群众的好处,基本群众应该拥护本币的道理”,使百姓懂得“农币是咱穷人的,白洋是老财的”^{[4]151}。

其三,建立经济旬报制度,强化基层金融建设。基层组织是党的制度运行的血管网络,西农币流通于边区广大农村,其信用的构建不仅依靠边区领导层的政策取向,更依靠各基层组织对政策因地制宜的执行。为深入了解边区各分区、县、乡的金融情形,边区自下而上建立了严格的报告制度,以便边区政府掌握、调控各地金融政策。1943年8月,晋绥边区贸易第八分局率先建立经济旬报制度,规定“各查验处应随时反映各地金融物价的变化每五天向支局报告一次,各支局应根据各查验处之反映及各方报告每半月向分局报告一次,分局每月将各地报告一起向各地报告一次”。此外,边区还要求“收集敌伪货币资料研究敌伪经济情况”^[36]。不过,由于此时正值日军扫荡,“各地金融经济情报多互相中断”,1943年11月日军扫荡结束后,边区要求“各地银行贸易局务须仍向总局规定执行”^[37],并修改汇报时间为“各支局于每月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必须报告分局一次,内容包含十日内金融与商业变化情况”^[38]。此后,该制度基本未曾中断。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边区政府不时予以核查,如交西县

于1944年3月30日上报的报告即被批评“完全失去真实,错误之处好多,希见令后负责把该贸易支局商店及各单位的全部收回交行署”^[39]。

经济旬报内容基本分为三项,一是地方金融情形,二是贸易往来情况,三是内部市场物价。旬报制度的不断完善,使边区政府能够实际出发,了解各地金融的真实情况。一方面,能够直观判断各地西农币信用高低。经济旬报每期需要汇报当地西农币兑换法币、银洋、伪币、友邻根据地货币的黑市牌价,外汇的出入情况以及对西农币、白洋等货币流通趋势。如1945年4月30日清交贸易支局的报告中写道,晋察冀边币1元兑换西农币1元、陕甘宁边币1元兑换西农币0.07元^[40],同时段晋绥第八分专署指导牌价陕甘宁边区1元可换西农币0.04元、晋察冀边币1元兑换西农币0.75元^[41],即可看出清交支局兑换友邻区货币时信用较弱,推动后续政策调整。另一方面,能够掌握地方物价情况,判断西农币购买力。各基层组织在报告时将地区各类物价进行汇报,边区政府汇总后再将总物价表下发各地。通过长期的旬报制度,边区加强了对基层经济的掌控力,为西农币在广大乡村的流通扫清了障碍。

2. 清理非本位币与扩大西农币阵地相结合,建立西农币货币市场

1944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边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巩固的边区政权使西农币已无须移植外部货币信用,亟须巩固其单一本位币地位。边区一方面对货币市场中的非本位币加大清理力度,另一方面扩大西农币的货币阵地,搭建以西农币为本位的货币市场。

清理非本位币的首要目标仍是银洋。尽管边区对银洋的禁令颁布已久,但由于“思想的不一致,条件不具备,银洋的流行虽然减少,但未禁绝”^{[3]188-189}。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布《关于彻底禁使银洋的指示》,重申对银洋行使的禁令,并于同月规定自1943年11月1日开始彻底禁止银洋流通,现存银洋必须到银行兑换,银行按照挂牌价格交付农币再加奖金,距离银行较远地区,百姓可委托区公所代兑,过期不兑而暗中行使则予以严惩^[42]。不过,由于日军对边区不断扫荡,禁止银洋工作的人力物力皆受到影响。故行署决定将此禁令延期1个月,宣传动员工作推迟至11月21日前完成,12月1日起必须禁止银洋流通^[43]。

为不使禁令落空,边区要求此次行动以县为单位,以群众力量巩固成果。此后,各地纷纷响应。晋

绥第八专署发布《彻底禁止银洋行使》的指示,要求1944年2月至3月首先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主要对象为公营商店、私商和群众。4月1日起开始严格缉私,将民兵与村干部作为缉私的主要力量,查获银洋后一律没收^[44]。同时,为激励百姓使用银洋兑换西农币,第八专署规定给予兑换银洋1元另给予10元西农币奖励^[45]。经过清理,百姓对于使用银洋的意愿逐步降低,银洋的兑换量不断增加,静乐县仅1944年12月即兑入银洋700余元^[46]。对于其他非本位币,边区亦禁止流通,并逐步清理。1944年12月,边区规定非本位币入口应卖交银行,不准私自携带和行使,出口者应经银行批准^[47]。

在清理非本位币的同时,边区以种种政策不断扩大西农币阵地,以此填补市场份额。

首先,发行贷款。贷款是西农币流向群众的最主要手段,1944年,边区再次扩大贷款发行规模,决定发放无利贷款5000万元,其中春耕贷款2500万元,种棉贷款1000万元,青苗贷款1500万元^{[4]224}。汲取了前期大量贷出西农币造成通胀的教训,边区认识到“农贷发放后市面上农币流通量膨胀”,“如果我们掌握不好,就会造成农币波动不已”^[48],但如果调控得当,则可将危机变为契机。以晋绥第八专署为例,专署提出各处贸易局、商店及合作社提前准备粮食、农具、日用家具等必需品用以消化贷出西农币,并将各地溢出物资进行调配,要求离东购粮200大石,100石在本县出售,100石向交西出售;汾阳购粮50大石,向交西出售。吸收贷出西农币后,专署要求各合作社商店再向群众购买土产品^[48],以此形成西农币的良性流通,保证西农币顺利推行。

其次,加强税收,扩大货币阵地。边区开展税收工作的目的之一即为“稳定金融,保证内地贸易自由”^[49]。边区在征收各类税费时规定只可收取西农币,因此积极的税收政策能够回笼民间西农币,确保西农币顺畅流通。对外贸易时,征收出入境税亦可促使各地商贩兑换西农币用以缴税,间接增加了银行的外汇储备。1940年,边区制定了《山西省第二游击区税务稽征暂行条例》,并不断补充与修改。1944年,边区内商品经济日渐活跃,边区发布《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征收营业税。

最后,在游击区推行西农币。随着西农币阵地的日渐稳固,实际上已具备向游击区推行的能力。1944年3月,边区要求“发展游击区贸易”,在“游击区设法多设小型商店,或游击商店,建立集市”^{[4]44}。此后,各县乡主动出击,将西农币向游击

区推行。以静乐县为例,县政府在各游击区建立食盐零销处,并与油坊建立卖货关系,完全使用西农币交易,另外在各区成立兑换所,便利群众兑换^[50]。1945年1月,晋绥第八专署提出在游击区活动的机关部队必须全部使用西农币,各县贸易支局征收公款时也一律收取本币^[51],渐渐扩大了西农币阵地。

3. 调控物资与发展商业相结合,巩固西农币流通空间

抗战爆发前,晋绥地区不但盛产玉米、高粱等五谷杂粮,而且棉、麻等油料作物以及红枣、核桃等果品的产量也十分可观。兴县、临县等地出产的油料,除供给本地之外,还有半数以上销售外地^[52]。这为边区的贸易事业打下良好基础。不过,由于战争摧残,边区内商业凋零,贸易事业几近停滞。黑峪口村战前“动辄成千上万的商业资本,目前则不到数百元”^[53]。商品经济发展受阻亦对西农币流通造成较大阻碍,由于市场供应不足,民间私下交易、以物易物盛行。因此,从物资着手,运用各种手段激发边区商品市场活力,为西农币流通提供市场条件,亦是巩固西农币信用体系的重要一环。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提出把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54]⁹²⁸,为大生产运动定下基本纲领,开启了敌后边区生产事业的新阶段。此后,边区响应中央号召,1944年1月召开第三届劳模大会时,提出将“武力与劳力结合”,要求“各机关部队负责人,必须亲自领导计划布置组织生产,要把今年的生产搞得更好些”^[55]¹⁷⁸。经过努力,边区获得物资上的大丰收,1944年仅兴县一地就组织起变工村387个,占全县村庄50%^[55]²⁶⁶,第六区种棉810垧,超上年17倍^[55]²⁶³。大兴生产为边区赢得了丰厚的内部物资,为下一步宏观调配物资供应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根据地的贸易建筑在生产事业的发展与对敌斗争胜利的基础上”^[4]⁵⁶⁹,生产发展后,边区拥有了足量物资供给对外贸易。1944年3月,边区要求“积极主动地开辟敌区贸易区贸易,积极主动地沟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边区的贸易”^[4]⁴⁰。5月,边区对老旧政策重新修订,发布《晋绥边区管理对外贸易办法》,对允许进口、出口物资进行详细规定,为这一时期的贸易工作定下基调。同时,边区改变了以大宗贸易为主的方针,提出“不只大宗要输出,小宗也不放弃,点滴不漏,积小成多”^[4]⁴¹。

除对外贸易外,边区同时进行内部县乡间的物资调配。边区各地物产种类、用度不一,这就要求边

区查漏补缺,宏观进行内部物资的调控。譬如,1944年6月,静乐县“贸易局棉花已用完,只有少数商人出口贸易,供不应求”。因此,由地方政府出面,在“东二区每日可买到十余石”^[56],有效缓解了缺棉现象。为健全调配体系,边区发动公商或机关部队,组织运输合作社,并吸收老百姓参加^[4]⁴³,为物资及时调配建立通道。经过调控,各地的物资缺口逐渐减少,1945年1月1日至10日,仅临县运往兴县的货物就有盐3740斤、白面600余斤、麻280余斤等^[57]。打通后方贸易后,“群众对本币又是一种新的认识,因为有大量的货物可供群众购买,同时带本币到与邻买货也很吃香”^[58],大大增强了西农币的信用。

充足的物资使政府能够更为主动地发展商品经济,为西农币流通提供商业空间。此前,“银行在商业投资上,数目也是很小的,总计农钞仅值64,700元,法币276,575元”^[4]¹⁰⁸,且大多为货币投入,并无直接的实物投资。汲取经验后,边区将货币发行与物资供应挂钩,进行以实物为主的商业投资,并规定西农币为购买物资的唯一货币,发展商品经济。

一方面,边区在各地开办商店,任务是“开展对外商业,维持本币,在执行政策下去赚钱”。同时,给予商店较大自主权,“直属分支局对其商店,只是执行政策上、业务方针上的指挥,具体经营不必干涉”^[4]⁴⁶,使其充分发挥市场功能。各地商店成为西农币的主要交易场所,由于物资种类充足,且政府规定在商店消费必须使用西农币,使西农币的硬性通货位置得以巩固。另一方面,边区定期在各县、乡中心组织大型集市,满足人民需求的同时促进西农币流通。1944年9月29日至10月6日,天池县举行骡马大会,边区事先进行大量准备工作,物资方面由贸易支局商店、合作社及私商进行供应,同时在会场张贴标语,并在学校进行宣传,此外仔细研究物价,将部分物资价格低于市场价出售。经过筹备,骡马大会每天到会人数四五千之多,本币流通量共60余万。因有足量物资供应,“商人对本币十分爱护,都争论着要做本币生意”^[59]。

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维持西农币信用的根基。边区赋予西农币一定价值后,亟须供应足量物资使西农币具有“流通手段”这一基本属性。在统一思想与整理货币市场后,西农币流通的政治与外部条件皆已成熟。因此,边区掌握足量物资供应市场,同时开辟多种交易市场,最终确保西农币得以为百姓所接受。

四、晋绥边区对西农币信用构建的历史意义

第一,从金融维度看,晋绥边区对西农币信用的成功构建使西农币成为边区主要流通货币,维护了边区金融秩序。货币信用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边区成立初期,货币市场庞杂,晋钞、伪币、法币因战争因素迅速贬值,边区遂发行西农币,但其信用体系难以迅速构建。经过努力,边区逐步稳定西农币信用,占领了该地区货币阵地,并达到币值稳定目标,如图4^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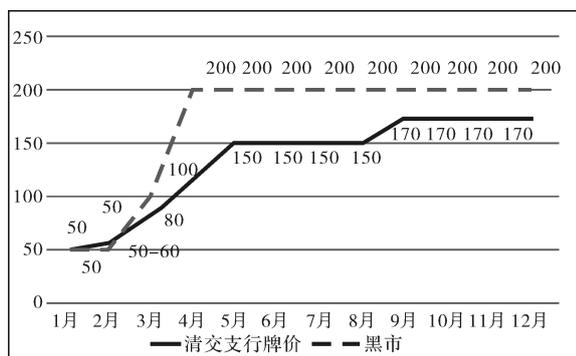


图4 1944年清交地区西农币与银洋比价图

稳定的币值使西农币不仅流通于中心区,在广大乡村亦是畅通无阻,如丁家沟34户有本币14642元,蛤蟆岭21户有本币4740元^{[4]144}。西农币高信用使用危害边区金融秩序的伪钞、白洋等货币寸步难行。在边区内部,伪钞基本不再流通,1945年1月,边区宣布各支行停止兑换伪钞,分行仍可少量兑换^[60],5月,边区内所有兑换所皆停止兑换伪钞^[61]。敌占区伪钞的流通空间亦是大幅缩小,1945年4月,日占区文水某村赶会时较小的交易基本不行使伪钞,平川地区甚至以布匹取代伪钞成为货币^[62]。清源地区伪钞信用一落千丈,1945年4月31日早晨伪钞450元折白洋1元,晚上即跌到520元^[63]。

第二,从军事维度看,晋绥边区对西农币信用的成功构建为部队筹措了大量战争经费,有力地保障了边区对敌作战。税收不仅可以直接增收,也是稳固政府财政信用的根基^[64]。在战争年代,能否构建良性税收关系,关乎财政稳定,更关乎新生政权能否生根发芽。构筑良好信用后,百姓使用西农币纳税的意愿增强,个人活动与政府纳税政策更契合,促进边区各项税收额增长。1940年,边区税收收入14476.77元,仅占总收入0.9%,而同年财政收入中

献金占45.1%,财政收入构成处于亚健康状态,难以长期为继。不过,1941年,边区税收收入达到181032.34元^⑧,税收收入占总收入22.1%^{[16]461}。1944年,边区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到了371400元^{[16]103}。

稳定的税收是边区财政良性发展的基础,使边区财政能够放开手脚投入、发展边区各项事业,进而使边区财政收入连年增长。边区1941年财政收入为820376.25元,1942年为994175.44元,1944年为6692409.52元,1945年为9978529.34元^{[16]461,469}。这无疑使边区政府有充足的革命经费用于对敌斗争。西农币信用稳定后,边区的财政收入有了大幅增长,边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使边币成为强势货币,而且使财政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抗战时期,各边区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为保障供给,且以保障军事供给为重点。1944年,边区政府在总结边区财政发展历程时写道:“在五年的收支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了抗战军费支出为主的支付原则,军费一般在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上下。”^[65]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边区能够更大限度地武装部队,更为积极地对侵华日军展开斗争。1944年,边区共进行大小战斗1410次,伤毙敌伪4617名,俘获日军51名、伪军527名^[66]。正如边区政府1944年所总结:“特别是这两年,我军力量日益生长,根据地日渐扩大与巩固。”^{[6]17}

第三,从经济维度看,晋绥边区对西农币信用的稳定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对敌斗争。晋绥边区地处乡村,连年战争破坏使内部小农经济枯竭。边区生产供给不足,军事作战需求较大,因此抗战前期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不得不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财政问题。通过对西农币信用体系的建设,边区同时探索出一条以货币发行促进生产发展的道路。随着西农币发行量的不断增加,边区对生产事业的投入也不断增加。1943年,边区发放青苗贷款660万元^{[4]220,221},1944年同期则增至1500万元^{[4]229}。抗战胜利前,农业贷款已发放出105094000元^{[4]328}。这些贷款有效对冲了西农币的发行数额,使其投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中,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业方面,1940年兴县地区耕地39万垧,1944年为56.25万垧,增加17.25万垧^{[55]262}。临县1941年耕牛共3344头,1943年为4581头^{[55]820}。纺织方面,兴县地区1940年纺车仅153辆,至1944年增至7853辆,涨幅达50余倍^{[55]264}。这些成果表明,西农币信用增长的过程,

同时也是边区生产发展的过程。

同时,货币信用的稳定使边区能够有充足资金发展重工业。抗战开始后,因战争所致,边区造纸业、煤业、铸铁业产量均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在西农币成功发行的四年间,煤的产量由1.8亿斤增加到2.78亿斤,铁的产量由180万斤增加到240万斤,榨油业的产量由146万斤增至320万斤,纸的产量由15800令增加到39300令,均超过了战前的产量,除自给外,还能向外输出,减少了输入的总值^{[6]585}。

此外,西农币信用的稳定,有利于减少贸易壁垒,促进物资生产与交流。从边区各区物资交流情形看,县与县间的物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稳定的西农币信用要求各地区物资间的宏观调配,也为地区间的贸易扫清障碍。譬如二分区、神府等地的粮食经常运销到三分区,三分区的土布销到神府、二分区等^{[4]461}。可见,作为各地区经济间的纽带和桥梁,西农币信用体系的稳固克服了货币杂乱、比价不固定等贸易发展障碍,使边区内商业市场日益繁荣。

各行业的长足发展,使边区有充足物资与资金调控物价,使边区物价一直维持在相对稳定程度。以米价为例,1940年为750元,1941年为900元,1942年为1925元,1943年为5950元^[65]。尽管边区物价总体上涨,但相比国统区较为温和,且上涨幅度基本与西农币信用正相关,当西农币信用体系得以成功构建,物价自然趋于稳定。

第四,从溢出效应看,晋绥边区对西农币信用的成功构建提高了民众对边区的政治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了革命事业凝聚力。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感与归属感,是西农币货币信用建设的溢出效应。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67]678-679}。实践证明,要发展和壮大边区,稳步推进革命事业,必须赢得群众信赖,打下良好群众基础。西农币的信用建设历程,充分体现其人民货币的本质,在其发展历程中,边区将“提高人民生产、发展工商业”与巩固农币有机结合,最终目的为改善人民生活^[68]。边区百姓纷纷认为“农币是咱们本地的票子,它越有办法,咱们的生活也就更有办法了”^[69]。广大百姓对西农币的信赖,代表着人民对抗日民主政权的认同和拥护。

不仅如此,西农币信用体系建设的政治效应同时溢出至游击区与敌占区。西农币的高信用使游击区的老百姓有时带着银洋来银行兑换,在交易时也希望收取西农币^[70]。“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

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67]679}经济领域的成功使边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形象深入人心,赢得了敌占区百姓的支持。1944年,汾阳百姓用捐助款项购买子弹送给八路军,“塞北的一个老汉利用给敌人驮水的机会把人民给我军买的医药送出城来”^[65]。

结 论

抗战时期,为解决财政困难、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各根据地纷纷成立银行,发行货币。晋绥边区发行西农币后,多次对西农币的货币信用体系进行建设。前期,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西农币信用迟迟难以完全构建。后期,边区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的成功,为西农币的流通开辟道路。在此条件下,边区将统一思想与基层治理相结合、清理非本位币与扩大西农币阵地相结合、调控物资与发展商业相结合,成功稳定西农币信用,探索出一条红色货币的信用体系建设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西农币的信用建设历程体现出党对货币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晋绥边区构建西农币信用的历程充分说明新生货币的信用建设要求政府同时具备强有力的行政能力与健全的市场服务两大条件。行政强制力能够让货币取得法定地位,快速垄断市场,否则易于被其他货币取代。但仅靠行政命令无法自动赋予货币信用,政府赋予的货币价值需要在市场中通过不断交换得以确立。正如边区领导人所指出的:“货币的流通,只能调剂,而不应阻止的;只能通过经济的形式,而不能加以人为的经济以外的办法来处理。”^{[5]154}尽管西农币的汇率长期低于银洋等金属货币,但由于战时民间自由贸易较少开展,对其信用的评判标准应以其发行量与购买力为准。换言之,只要百姓手中有足量西农币,并能够在边区内部便捷购买到所需物资,西农币信用就趋于稳定。

西农币的信用建设历程亦体现出党的执政能力从局部到整体的转变。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54]896}在构建西农币信用的历程中,边区政府并未承袭苏区时期的货币发行传统,而是先行强化组织管理,加强基层干部与金融干部的思想认识,并在经济上以税收为通道,以贸易管理和货币斗争作为工具,以发展生产为目标,充分发挥各部门优势,协同作战。至

抗战后期,中共边区的金融、贸易、税收、生产等部门逐渐联系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能够充分发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愈发展现出现代化政党的特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原因之一。

注释

①光梅红:《抗战时期西农币信用危机及原因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8期;孟先彤、李静萍:《独立自主、人民至上的成功实践:西农币的发行与流通》,《经济问题》2023年第9期;宋利:《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西农币的历史作用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②资料来源:《晋西北货币金融工作概况》(1941年12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51页。说明:因原史料中10月存在两种比值,故提取两个10月的比值。③本文中银洋和白洋是同一种货币。④《抗战日报》为党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1946年7月1日改名《晋绥日报》。⑤资料来源:《晋西北货币金融的发展简况及现状》(1942年9月),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91页。说明:由于原表中数据分为上中下旬,过于庞杂,故只取每月上旬汇率。⑥数据来源:《一年来金融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的任务与方针》(1944年8月5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116页。⑦资料来源:清交支局行:《清交支局行1944年金融贸易工作总结》,山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A096-0003-0032-0001。说明:原史料中缺少清交支行4月牌价。⑧因西农币汇率不断浮动,这些数字以银洋为计算单位。

参考文献

[1]樊润德,路敦荣.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1集[M].吕梁:吕梁地区印刷厂,1983:115.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兴县文史资料:第7辑[M].临县:临县印刷厂,1995:71-72.

[3]杨世源.西北农民银行史料[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4]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7]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M].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70.

[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八路军·文献[G].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

[9]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晋绥革命根据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236.

[10]中国銀行関係雑件/中国連合準備銀行(1939-01-23-1942-03-31)[A].东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B08061387200.

[11]Reference materials concerning measures for Japan-related currency in China(1939-05-30)[A].东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

B02030560800.

[12]連銀券法幣交換価値切下に関する件(1938-08-03)[A].东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04120466900.

[13]七大方策による聯銀券価値向上対策(1940-03-19)[A].东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11110887500.

[14]附表 各省に於ける連銀券流通分野状況調査要図(1940-11-20)[A].东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号:C11110613300.

[15]巩固西北农民钞票[N].抗战日报,1940-11-27(1).

[16]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编[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17]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G].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8]禁绝银洋的法令要点(1941-11-01)[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88-0005-0012-0003.

[19]行署布告军民 严禁行使贩运银洋[N].抗战日报,1941-12-03(3).

[20]兴县暗使银洋案四件 经行署核准依法判处[N].抗战日报,1941-01-06(3).

[21]上海市档案馆.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G].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443.

[22]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电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为呈报防止法币倒流及限制物品运输办法(1941-11-18)[A].台北:台湾文献馆,档号:001-110010-00024-001.

[23]1943年金融工作总结(1943-00-00)[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21-0008-0003-0001.

[24]非法周使法币之稽查与惩治办法(1942-12-15)[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88-0002-0016-0007.

[25]行署号召全体人民 踊跃认购公债[N].抗战日报,1943-01-30(2).

[26]行政公署通令 严禁奢侈品入境[N].抗战日报,1943-01-16(1).

[27]严格管理对外贸易 贸易局规定办法[N].抗战日报,1943-02-09(1).

[28]西北农民银行关于发行春耕贷款的指示信[N].抗战日报,1943-01-19(4).

[29]目前农贷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西北农民银行关于农贷的补充指示)[N].抗战日报,1943-02-18(4).

[30]行政公署增发农业纺织贷款百卅万[N].抗战日报,1943-03-04(1).

[31]中共晋绥分局关于发行农币的规定(1943-03-17)[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21-0008-0020-0004.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78.

[33]贸易金融工作会议干部思想反省要点(1944-05)[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1-0022-0007.

[34]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推进贸易金融工作认真调查研究材料的通知(1944-09-20)[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1-0011-0003.

[35]经济通讯1943-9月第2号(1943-09-21)[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40-0001-0032-0001.

[36]晋绥边区贸易第八分局关于查验经济情报制度的通知(1943-08-27)[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1-0022-

- 0002.
- [37]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金融贸易工作的命令(1943-11-15)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0-0004-0097-0013.
- [38] 关于布置整理商店、建立粮店、建立经济旬报工作报告的通知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2-0014.
- [39] 晋绥第八专署关于收回经济情报交给西县政府的密令(1944-04-17)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30-0001-0026-0001.
- [40] 清交贸易支局经济旬报 1945 年 4 月份第 12 期(1945-04-30)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4-0013.
- [41] 晋绥边区银行贸易第八分行局经济旬报 1945 年 4 月第 20 期(1945-04-30)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31-0026.
- [42] 行署颁布布告 禁绝银洋行使 [N].抗战日报,1943-09-21(2).
- [43] 晋西北行署关于银洋禁止行使的通告(1943-10-21)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88-0005-0012-0006.
- [44] 晋绥第八专署关于彻底禁止银洋使用的命令(1944-02-15)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5-0002.
- [45] 西北农民银行第八分行关于白洋兑换农币给予奖励的通知(1944-01-14)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5-0003.
- [46] 静阳县贸易银行支局行工作总结(1945-01-15)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40-0001-0034-0002.
- [47]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本位币与赤金流通和行使规定的令(1944-12-05)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1-0011-0001.
- [48] 晋绥第八专署关于发放农贷后巩固金融的指示信(1944-02-13)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5-0001.
- [49] 财政经济会议税务工作材料(1944-06-04)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0-0004-0071-0002.
- [50] 静阳县贸易银行支局行工作总结(1945-01-15)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40-0001-0034-0002.
- [51] 晋绥第八专署关于推行使用本币交易的通知(1945-01-23)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3-0028.
- [52] 刘欣,景占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44.
- [53] 关于黑峪口村商业调查的材料(1942-09)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41-0001-0100-0002.
- [5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5]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 [56] 经济旬报:金融、贸易、物价(1944-06-18)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40-0001-0012-0013.
- [57] 神府贸易支局 1945 年 1 月 1 日至 10 日经济旬报表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31-0031.
- [58] 静阳县贸易银行支局行工作总结(1945-01-15)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140-0001-0034-0002.
- [59] 经验介绍:骡马大会(1945-01-17)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1-0013-0002.
- [60] 晋绥边区第八分局、晋绥边区银行第八分行关于非本位币兑换价格规定的通知(1945-01-22)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5-0015.
- [61] 晋绥边区银行贸易第八分行局关于停止兑换伪钞的通知(1945-05-04)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5-0014.
- [62] 关于物价情况、伪钞贬值、物资运输问题的资料(1945-04-22)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4-0023.
- [63] 伪钞一日数跌 价值不如手纸 [N].抗战日报,1945-05-24(1).
- [64] 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33.
- [65] 晋绥边区的财政政策概况(1944-08-27)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21-0008-0007-0001.
- [66]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4集[M].吕梁:吕梁地区印刷厂,1984:153.
- [6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8] 抓紧时机完成财政任务 [N].抗战日报,1943-03-25(1).
- [69] 农币在群众中 [N].抗战日报,1943-04-22(2).
- [70] 经济旬报 1945 年 1 月第 18 期(1945-01-08) [A].太原:山西省档案馆,档号:A096-0003-0024-0006.

The Credit Construction of Xinnong Currency in the Jin-Su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He Jiawei Chang Chen

Abstract: After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PC established a bank in the Jin-Sui Base Area, issued Xinnong Currency, and continuously attempted to build its credit. In the early stage, the base area gradually promoted Xinnong Currency as a subsidiary currency of the legal tender (Fabi), but it faced a credit crisis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reafter, the base area made continuous attempts, including first implementing a single-currency system, then shifting to a multiple-currency system, both of which failed. Policy fluctuations triggered inflation, causing the credit of Xinnong Currency to decline steadily. After summing up experience, the base area began to reconstruct the credit of Xinnong Currency: taking ideological guidance first,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onsolidat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Xinnong Currency. It then combined the cleanup of non-standard currencies with the expansion of Xinnong Currency's market, established a Xinnong Currency monetary market, and regarded material regulation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s important means to consolidate its credit, ultimately stabilizing the currency's credit. The success of Xinnong Currency's credit construction, as a vit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emocratic Economy, represented the CPC's shift in governing capacity from local to overall, and also reflected its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laws.

Key words: Jin-Sui Base Area; Xinnong Currency; monetary credit

责任编辑:长 亭